

红色保险事业的初步探索

□ 王新居

自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列强用船坚利炮打开了我国的大门,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了各种在华特权,开发扩张垄断了我国的保险市场。而且对华商承保条件极其苛刻,配合洋商对我民族实业实施双重的控制操纵。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下,中国人民固有的防灾抗险能力日益衰弱,中华民族传统的风险保障机制失去作用,亿万工农无产阶级和大多数中产阶级,时刻都面临着失业破产和饥寒伤亡的威胁。

建党夺权求复兴,立法施政谋福利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作出了为中华民族求复兴、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庄严承诺,并设立了全国劳动者团体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劳动者最低限度的诉求——《劳动法大纲》。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明确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和宗旨,在于“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劳动法大纲》公开要求,“一切保险事业,须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出之,受保者决不分担”。

在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局部地区的执政地位后,各根据地开始正式确立和实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健全了各级工会、劳动委员会和社会保险局等专门机构,密集出台了各项强制性的劳动政策法规。如第一次全苏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硬性规定雇主必须按雇工应得工资的10%至15%缴纳保险费,作为社会保险基金。同时详细划分了社会保险的优恤种类,说明了优恤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以及优恤金的额度和领取办法。

根据地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劳动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严格监督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和用途。千部

县苏维埃劳动部文书贪污社会保险金20余元,被罚款做苦工5个月。江西省木船工会委员长彭士淳、芦汗魁挪用社会保险金,被罚款做苦工40天。中央印刷厂社会保险局长曾玉浪、会计廖前生和保险委员王承根,合伙贪污社会保险金72.7元;石城县苏维埃劳动部副部长谢德昌挪用社会保险金19元,其他工作人员总计挪用459.29元,诸犯均受到严厉制裁。

自力更生保平安,互助合作化危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走上反帝反封建的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早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根据地大多处于山高路险、地瘠民贫的区域。再加上四周持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不仅工农群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需要救助的人太多,资本家和富农的日子也不好过,依靠资方筹集社会保险基金越来越困难。如果机械地执行过高经济要求的劳动法,对私有资本采取“吃完再说,不管将来”的不负责态度,反而会加剧了工商业的衰败。

根据地政府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开展互助合作和生产自救。福建省职工联合会筹集1500元社会保险费,救济了六七百个失业工人,并发动木船工人集资募股创办旧船合作社,在短期内制造了300艘木船,有效地解决了木船和锯板造船等相关产业工人的就业。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动盐业工人集资募股,创办食盐生产和运输合作社,盐工工资增加了50%以上。公营盐业公司还拿出销售总收入的3%,为盐工提供社会保险救济。

中央苏区瑞金县石水乡过去30%的农民没有耕牛,租牛耕种一担谷田需要出5斤稻谷。他们集股购买耕牛,创办犁牛合作社,耕种两年节省的牛租就可赚到一头壮牛。陕北无牛农民过去出力“伙种”,受牛租剥削高达每垧2斗以上。陕甘宁边区政府大力推

广石水乡的经验,提倡无牛农民集股买牛、合喂合用。定边县农民还在犁牛合作社的基础上,首创牲畜保险合作社,廉价为社员提供牲畜防疫治病和繁育改良等服务,其做法已经具备了商业保险的性质。

红区白区分两线,公营私营归一统

中国共产党孕育于北京,诞生于上海,但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竟连上海党中央机关都差点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重新建立地下党组织。毛泽东亲自制定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周恩来布置了“第三条”隐蔽战线,主要是以做生意、办企业的名义,在实业界包括保险业发展党员、结交朋友,执行筹集经费、收集情报和掩护地下活动等任务。

1938年5月,由上海金融业党委书记张承宗组织,成立了上海保险业党支部;同年7月,由地下党员胡詠骥、谢寿天和林震峰发起,成立了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1942年5月,由地下党员谢寿天筹划,创办了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次年11月,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广大华行牵头,联合中兴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分公司和民生轮船公司,创办了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践行了党对民族实业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从红区白区两条战线,进行红色保险事业的初步探索实践,切实保障了最广大阶层的利益,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和民族实业的发展,也为自己赢得了民心、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久宣告成立,随后全面接管、整顿和改造了旧保险行业。到1952年年底,外资保险公司全部自动停业,退出了我国的保险市场,开启了人民保险事业的新篇章。



南梁红色故事

习仲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里,习仲勋曾多次遭遇险境,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发生在1935年春天的一次突围战斗。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亦相继建立。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浪潮不断高涨,这不仅震撼了陕甘军阀,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恐慌。

1934年10月,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围追堵截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一面加紧筹划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武装斗争,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周家硷会议,从组织上统一了两块苏区党的领导工作和军事指挥工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发布了反“围剿”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

反“围剿”动员令发布后,习仲勋根据刘志丹的统一安排,结合陕甘边区实际,立即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进行部署和动员。习仲勋说:“在马鸿宾以10个团向陕甘边进攻时,我们粉碎‘围剿’的战略计划是:放弃南梁苏区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展。在果川、头道川一带创造发展了新苏区。骑兵团在韩城、宜川、白水、蒲城一带切断冯钦哉的后路。关中红一团向正宁一带敌后进攻,并配合关中游击队坚持斗争,王宝珊带游击队向陇东发展,二团向三边发展,红三团、义勇军则上陕北配合红二十七军消灭高桂滋敌军。在这个计划下,进行了反‘围剿’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南梁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总是和我们一起坚持战争,终于在刘、高统帅下的红军主力在杨家院子、延长、靖边等战役后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

1935年1月,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率先发起了向陕甘边苏区的进攻。国民党军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另一路经固原、西峰、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马鸿宾部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敌人采取了“堡垒”战术,在到达悦乐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战略村”,企图切断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白豹等地就修筑碉堡35座。

在敌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梅生贵率领第二路游击区各游击队、赤卫军用疑兵之计打击敌人。游击队、赤卫军在老爷岭上搭设许多毛毡帐篷,在密林中竖起红旗。白天,游击队高举红旗到处游击;夜晚,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派出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敌军,多疑的敌军在老爷岭以西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不敢贸然进军,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行动。

4月13日,马鸿宾部在得悉红军主力已撤离南梁,转兵陕北的消息后,恼羞成怒,倾巢出动,占领了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二将川、荔园堡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寨子湾,南梁苏区沦陷。敌人对撤离一空的寨子湾进行疯狂破坏,门窗和窑洞全部损毁,财物和粮草洗劫一空。与此同时,敌人又调集500余骑兵紧紧追击刚刚转移的习仲勋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

4月16日,国民党军与合水保安队在豹子川、白沙川的交汇处的张岔岭将习仲勋率领的后方机关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率部阻击敌军。经过激烈战斗,赤卫军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梅生贵一个人,还英勇地击退了敌军的数次冲锋。梅生贵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面对敌人疯狂的“围剿”,习仲勋果断决定分散突围。在政府保卫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王殿斌率部英勇阻击下,习仲勋和政府工作人员开始分散突围。习仲勋骑一匹白马,冲出敌军包围圈,但马鸿宾部骑兵紧追不舍,情急之中,习仲勋连连加鞭,催马急驰。脱离险境后,习仲勋集合分散突围出来的100多人,在阎家湾暂时立足休整。

这时,习仲勋才发现自己的双脚都被马磨磨了两个血洞,所骑的白色战马身上也被条条鞭痕染的血红。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曾拍着白马风趣地说:“好一匹身兼教主的白龙马!”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连载上)

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

□ 张天雁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榆林寺、上洞子,位于瓜州县城南70公里的峡谷中,榆林河(亦名踏实河)从谷底流过,因河岸榆树成林而得名,是我国著名的石窟之一。

榆林窟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直立的西峭壁上,始凿于北魏时期,唐、五代、宋、西夏、元、清各代均有开凿,同敦煌莫高窟在内容、艺术风格、绘画形式方面一脉相承,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莫高窟并称为姊妹窟。现存洞窟43窟,其中,东岸32窟,西岸11窟。依据壁画风格、游人题记、榜题结衔判断,存有唐代4窟、五代8窟、宋代13窟、西夏4窟、元代4窟、清代9窟。分布面积112850平方米,壁画面积4200平方米,彩绘佛、道图10856幅,彩塑244身。

榆林窟形制主要有中心佛坛窟、中心塔柱窟、大像窟等三种,各类窟形均始于唐代,以后成定式沿用。榆林窟的彩塑均为木骨泥塑,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原作已所剩无几,现存彩塑多为清代重修或重塑,艺术性极差。彩塑内容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形式有圆塑、浮塑等;塑像大多属群身像,一铺三至九身不等。榆林窟彩塑以第6窟唐塑大佛为代表,高约20米,虽经历代修改装奘,但仍保留唐代遗风。

榆林窟的历史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壁画上,壁画内容和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壁画保存完好,内容丰富,多为唐代至元代800年间的作品,有场面宏大的巨幅经变画、形象生动的单幅佛像画、装饰图案和种类繁多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还有一定数量的社会生活、生产、科技等方面的现实生活场景。榆林窟壁画根据特点可分为中唐(吐蕃统治时期)、五代、北宋、回鹘、西夏、元六个时期。壁画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有铁线描、高古游丝描,也有兰叶描。壁画内容包括6个方面,有经变,如《观无量寿经变》《弥勒净土变》《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报恩经变》《华严经变》《劳度叉斗圣变》《文殊变》《普贤变》《观音经变》《梵网经变》等。有佛像,如千佛、说法图、弥勒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水月观音、天龙八部等。有密教图,如坛城图、明王像、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等。有佛教事迹,如《牛头山组画》《唐僧取经图》等。有装饰图案,用于藻井、圆光、边饰、地毯、桌围、器物;服饰方面有团龙、翔凤、麒麟、天马、华鸭、莲花、宝相花、几何纹、法器纹等,结构严密,色彩绚丽。有供养人,如瓜沙曹氏家族功德像、都勾当画院画家的形象、西夏时期党项武官画像、蒙古贵族画像等。

榆林窟壁画不仅是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反映唐至元代现实生活历史资料的宝库,其中的一些壁画具有科学价值。如《酿酒图》《锻铁图》说明早在八九百年前,鼓风机在我国已得到普遍推广。反映农业方面的有犁耕图、加工稻谷的踏碓图,犁、耙、锄等生产和生活用具,放马、牧牛、拉牲毛驴上坡、挤牛奶、井上打水以及院落马厩、牲畜饲养等。反映衣着、装饰等方面的有衣服服饰、藻井、装饰图案、织锦、染织等,显示了历代丝绸等纺织品的技术水平。在一些经变画中还会绘有车、船等古代陆水交通工具,一些日月、天象图以及一些古代兵器,所有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西夏窟的壁画中两幅《唐僧取经图》,比明代吴承恩著的小说《西游记》早了340余年,是反映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早期艺术作品,堪称旷世绝品。

榆林窟壁画还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像供养人画像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而且这些画像和题记为研究瓜沙曹氏统治河西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1961年3月,榆林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珍赏

金印蕴含古代民族政策

□ 李奎清



晋蛮夷归义侯蛇钮金印,长2.2厘米,宽2.2厘米,高2.2厘米,重85.5克,收藏于武汉博物馆藏。印为纯金制成,金黄色,印钮为蛇状,双目圆睁,凸起,盘身,背部饰有稀疏的圆形鳞纹。蛇身下中间有一不规则的穿孔。印面大篆阴文三行六字:“晋蛮夷归义侯。”文字排列规范,刻划纤秀而劲挺,富有章法。

蛮夷,古代泛指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多数情况下,蛮夷狄统称蛮夷或四夷。《礼记·王制》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髮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狄,被髮毛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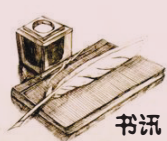
在我国古代,封建帝王对少数民族主要有征伐与怀柔两种政策。据《尚书·虞书·禹典》记载:“柔远能迩,德薄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意思是说只有安抚好远方的百姓,爱护近处的百姓,亲厚有道德的君子,信任善良的人,而又拒绝奸佞小人,边远的外族人就会相率服从了。《史记·五帝本纪》亦有类似的记述:“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这些史籍中所称的蛮夷,指的都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汉武帝时期穷兵黩武,四处出兵,连连征战不息,东并朝鲜,西征大宛,南吞百越,北破匈奴,收取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打通西域,封狼居胥,攘夷拓土,国威远扬,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阴山甚至更地域,令西域众蛮夷臣服。历史上



怀柔政策较著名的也出自西汉,汉元帝采取和亲策略,将王昭君嫁给南匈奴呼邪邪单于,数十年间,西汉与匈奴止兵息武,一直保持和睦友好的关系,加强了双方的交流,使当时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产生对中原先进制度的向往,促使一些少数民族改变了中原政权的敌视政策,并效仿中原制度。

印章是古代身份的凭证和行使职权的工具,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晋代,蛮夷多指南方及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为了笼络有些归顺朝廷的少数民族头领,便封赏他们以王、侯爵位,并赐印为信物。归义侯是汉晋时期朝廷赐予少数民族首领的封爵,据《后汉书·百官志五》载:“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东晋时,朝廷以“归义侯”封授被征服的政权的统治者,包括在统一过程中主动投入朝廷的割据势力,亦有主动归附朝廷的少数民族势力头领,如公元347年,东晋派大司马桓温进攻成汉,成汉皇帝李势兵败,自缚投降,前往桓温营中投降,被东晋朝廷封为归义侯。晋蛮夷归义侯蛇钮金印发现于湖北恩施,商周时期,恩施属于蛮荒之地,魏晋时期的恩施地区属于南蛮之地,晋王朝对这一蛮夷部落首领实行怀柔政策,刻印赐赠,以示笼络,体现了当时各民族的融合已达到一定程度。

这方金印制作精致,工艺抽象简练,印文布局严谨,结体端庄稳重,刻划瘦挺,丰满道劲,虽历经1000多年,依旧灿然生辉,对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实物参考价值。



书讯

近日,由政协民乐县第九届委员会编辑的第二十辑民乐文史资料《民乐华章》出版发行。

《民乐华章》由《史话民乐》《多彩民乐》《魅力民乐》《印象民乐》《诗意民乐》五辑组成,约33万字。《民乐华章》于今年4月下旬面向全国发出约稿函,共收录全国知名文艺家所创作的宣传民乐历史文化资源、讴歌

民乐文史资料《民乐华章》出版发行

民乐辉煌成就的各类文艺作品160件,其中文学作品86件,美术书法作品35件,摄影作品39件。入选作品分别从历史物沉和现实巨变的高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第三只眼睛多角度透视民乐的文化旅游资源、城乡建设巨变和创新进取精神,展示了光辉灿烂的美好愿景。该书编辑出版,恰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和民乐县委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即

将召开之际,对全县文化精神财富的积累、人民奋斗信心的提升、挖掘弘扬优秀地方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为广大文史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借鉴的资料,对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民乐文艺事业聚集了丰厚的精神营养,达到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目标。

(民乐县政协)